
侵华战争中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

王春南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以轰炸、纵火、劫掠等种种暴虐、野蛮手段,极力毁灭中国大中小学、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摧残至为酷烈,给中华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

中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数字,包括文化教育损失的数字。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各学校、机关按照统一格式,及时上报因遭日本侵略军破坏而蒙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情况和确切数字。报告不及时,即函电交驰,促其速报。受损失单位,所作报告,都是郑重其事的。抗战胜利前后,中国为参加有关国际会议曾汇总过战时损失的数字,向日本索赔时提到的数字,更是经过多方调查、反复核实的。它确实可靠,可以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依据。

(一)

中国的各级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极其严重。

日本侵略者竭力想摧垮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以遂其灭亡中国之心愿。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一届大会上递交的报告书,即一针见血地指出:

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智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到其长

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毁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是惊人。^①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教育文化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事发生,密集沪市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② 具体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 位于吴淞。房屋15幢多被炮弹及炸弹轰毁,而工厂及新落成之生理研究馆损失尤重。

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 在江湾。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日军机关枪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校具等,概遭焚毁。中学部此前即被日军放火焚烧。

上海法学院 在江湾路。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 在江湾。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

中国公学 在炮台湾。所有校舍、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篋、书籍等,均焚毁无余。

私立复旦大学 在江湾。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日军长久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③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被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9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282)。

③ 《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 14 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 7438187 元。^①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日军掀起破坏中国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 年 7 月 29 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② 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至 8 月 1 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③

半月以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本军部出动 100 余架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有 92 所文教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遭全毁的占 75%。^④

自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 10 月 13 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 61 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⑤ 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 50 多次，出动飞机超过 800 架，投弹 160 多吨。^⑥ 1937 年 8 月 15 日至 26 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据载：

第一次为八月十五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十九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二百五十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二十六日深夜，在实验学校投同样炸弹一枚，又附近

① 《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② 〔日〕石岛纪之前引书：《中国抗日战争史》，郑玉纯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60 页、61 页。

③ 《申报》1937 年 7 月 30 日、8 月 1 日载中央社天津讯（7 月 29 日、31 日）。

④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104—105 页。

⑤ 〔日〕石岛纪之，前引书，第 60 页、61 页。

⑥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101、111 页。

教授住宅被毁者四所，校工死者五人。^①

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之事实声明(英文)。声明略称：

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二十三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三十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辽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②

有人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预料，战火势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为避兵燹，中国东南部及华北的高等学校，从1937年春天起就开始内迁。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③浙江英士大学在抗战中迁移六七次之多。^④而广州大学八年中七迁校址。^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1937年9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次年4月迁云南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于七七事变后在西安组建西北临时大学，次年3月，以西安常受敌机侵扰，迁陕南城固、南郑、沔县等处，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对内地及辗转千里迁至内地的大批学校，日机仍经常袭击，不予放过。

1938年4月10日，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遭日机疯狂轰炸。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

① 罗家伦为学校内迁事至教育部长王世杰函，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287)。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第191页。

③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423页。

④ 《竺可桢日记》I，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876页。

⑤ 《国立大学各项统计表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2048)。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二十七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①

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二十七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五十余枚,爆炸弹三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三百万元以上”。^②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③湖大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的电报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④此可谓历尽磨难。

杭州浙江大学多次播迁,不得稍安,虽避入西南,日机仍跟踪而至。该校先是迁天目山、建德,后迁江西吉安,旋迁泰和,又迁广西宜山,1940年迁贵州青岩、遵义,稍后农院及化学系迁湄潭。^⑤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窜入广西宜山上空,向浙大扔下50—100公斤的炸弹,“(弹坑)直径约一丈五、六左右”。次日浙大校长竺可桢在纪念周作报告,谴责日军对中国教育机关的破坏,“谓以日本人之迭次摧残文化,浙大早应在被炸之列。如北方南开、昆明

① 《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员等问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322)。

② 《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员等问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③ 《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员等问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④ 《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员等问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⑤ 《竺可桢日记》附《大事纪要》。

联大、南京中大、梧州西大、长沙之湖大、八步之同济皆一再被炸，而本校之独后已属偶然之事”。^①

1940年5月29日，国立西北医学院向教育部报告：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该校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②

日机轰炸南郑的同日，又在重庆肆虐。日机出动70架，将重庆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余烬尚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5月29日，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③

上述各校惨遭日机轰炸的当日，重庆、复旦、中央三大学致电美国，揭露日军暴行。电文系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拟代发。该部5月30日致教育部函云：

日来日机肆虐，竟及黉学，复旦、重庆等大学均受损失，其摧残我文化之用意殊堪发指。本部为向美国宣传敌方暴行起见，昨特代重庆、复旦、中央三大学致电美国具述敌机暴行，请禁运钢铁、石油，至日已经拍发，今日各报均照刊出，除分函以上各校外，用特函达。^④

国民党中宣部代三校致电美国的同时，又以复旦大学代校长吴南轩、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等名义，致电美国《纽约时报》主笔。电文云：

敌机肆虐，轰炸后方不设防城市，残杀无辜平民，即妇孺亦所不免，早为举世所知。……本月廿六日，敌机飞袭渝郊，炸毁我复旦中学校舍。廿七（九）日空袭北碚，复炸我复旦大学校舍，致学生膳宿之

① 《竺可桢日记》1，第307页。

② 《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284）。

③ 同上档案。

④ 同上档案。

所及图书、仪器,大半毁损。其摧残文化荼毒平民,殊堪发指。南轩等谨代表重庆市各大中学校校长,向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之贵国人士呼吁。^①

上述电报拍发的当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函于斌、张伯苓等人,说明事情紧急,不及征询意见。信中透露,用于斌等人名义致电欧美等国文化界,乃奉蒋介石之命行事。此函云:

敌人摧残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医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奉委员长谕,用先生名义致电欧美各国文化界。因时间急促,未及征求同意,已先发电。特函奉达,敬希亮察为幸。^②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对中国教育文化的破坏,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但它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在重庆、复旦等大学被炸后,又有西北农学院、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相继遭到日机袭击。^③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校复员,陆续迁回原址。但见满目疮痍,残破不堪,战争初期未及抢运出去的图书、仪器、校具等,或荡然无存,或残存无几。《南京市教育复员工作报告》云:“京市教育,遭受敌伪长期蹂躏,基础已失,规复特难。”^④ 在1946年4月教育部召开的关于学校复员的几次座谈会上,江苏省教育厅厅长陈石珍说:“本省学校校舍破坏甚大,全部破坏者为数亦多。”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汪少伦说:“战时各级学校校舍大部破坏。”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燧说:“江西省中等学校大都遭受破坏,尤以南昌为甚,未受战时影响者仅三县。”^⑤ 教育部驻平津特派员办公处向教育部报告:战后接收中调查,“(北平)全市各级学校及社教(即社会教育——引

① 《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② 《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③ 《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④ 《关于上海、南京、青岛教育复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13)。

⑤ 《关于上海、南京、青岛教育复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者：机关共计二百四十五处，其校舍坍塌、校具破烂、图书焚毁偷窃，仪器残缺，损失实居大半”。“清华大学校舍颇受损失，图书仪器损失殆尽，恢复比较困难”。这就是日军灭绝人性的大破坏，人类教育文化遭受的空前浩劫。

(二)

中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

对中国的图书，日本侵略者能抢则抢，抢不走则焚。凡宣传抗日爱国，不利于侵略者的书籍，它统统要焚毁。日本占领东北后，“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余万册”。^①日军侵占华北后，“华北各地之图书馆藏书凡有抗日、排日（内容）之书籍，皆被没收，易以亲日、反国民政府之书刊”。^②

在华东地区，日本侵略者从一二八淞沪事变起，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这次事变中，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持志学院等学校图书馆，均被炸毁或焚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③，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1/7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④1937年冬，杭州沦陷后，藏书家王绶山的私人藏书为日军劫夺。王绶山于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⑤八一三事变后，南京的江苏省立图书馆及国立中央图书馆开始转

①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066页。

② 《关于北京、天津教育复员的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14)。

③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闻记》，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1979年9月。

④ 林尔蔚：《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⑤ 《竺可桢日记》I，第1164—1165页。

移藏书。国学图书馆至1937年馆藏图书达24万余册。馆长柳诒徵将善本古籍装箱，移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地库；丛书及地方志，舟运苏北兴化罗汉寺及北门外观音阁，计3万余册；善本古籍15万册，仍藏南京龙蟠里。后兴化藏书大部为日伪军焚毁、劫掠，小部散失。南京龙蟠里藏书被日军劫移竺桥地质陈列馆。中央图书馆至七七事变发生，已藏书40万册，同年11月迁重庆。因运书船只失慎及日机狂炸重庆，藏书锐减至18万册。^①该馆留在南京的图书则被日军抢走。侵华日军在南京不但劫夺国家图书馆藏书，而且搜劫私家藏书。门东卢冀野，藏书不下数十万卷，多有珍贵古籍，悉为日军焚窃。大石坝街50号石筱轩家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从1938年3月起，日军又进一步搜缴南京的公私图书，共装300多卡车，计88万册。^②

1936年度到1946年度全国图书馆数 ^③			
年度	图书馆数	年度	图书馆数
1936—1937	1848	1942—1943	1135
1937—1938	1123	1943—1944	940
1938—1939	1178	1944—1945	706
1939—1940	1002	1945—1946	704
1940—1941	872	1946—1947	831
1941—1942	1066		

- ① 梅可华：《南京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鼓楼文史》第2辑，1990年出版。
- ② “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88页。
- ③ 据《全国高等学校概况统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图书馆事业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1946年,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虽逐渐恢复,据一九四三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九百四十所,约占战前百分之五〇·八六”。^①

战后日本归还中国图书,但仅占中国战时损失图书的5·29%。“归还之书籍共计一五八八七三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先后分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其余多为普通书籍。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三百万册”。^②

对中国的文物,日本侵略者更是贪婪掠夺,大肆破坏。由以下三点可以看出战时中国文物遭受损失之惨重:

第一,博物馆被炸或被劫,战争后期较战前,全国博物馆总数减少一半以上。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

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三十七所,工作人员一一〇人。战事起后,故宫博物馆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一九四四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十八所。^③

江浙沪一带的博物馆受害尤深。上海博物馆于八一三事变中为日机所炸毁。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于1939年11月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④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2038)。

② 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11页。

③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④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110页。

第二,战时日军劫夺文物数量惊人。日本对中国文物,“多年以来,巧取豪夺,数难胜计。战时更作大量之掠夺。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所编《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三六〇七〇七四件,另一八七〇箱;又被劫古迹七四一处。以上估价共值国币(战前币值)九八八五六四六元。”^①仅南京一地,被日军抢劫的古字画就有2·84万件,古玩7300件。^②抗战胜利后,经过交涉,日本归还了少量文物。

第三,在战争期间,大量无价之宝被日军劫走,也有的稀世之宝下落不明。如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由北平协和医学院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后传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③1944年5月13日,日本宪兵在北平将裴文中扣押,追问北京人头盖骨到哪儿去了,裴答“不知道”。^④日本宪兵果真不知北京人头盖骨去向,还是故意施放烟雾?战后中国曾派裴文中、李济前往日本调查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会同日本考古专家原田淑人等努力调查,未获满意结果。^⑤不管北京人头盖骨去向如何,中国因失去它而造成的无可估量的损失,都是跟日本侵华战争直接相关的。

(三)

战时我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损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的损失。仅中央研究院1937年7月7

① 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第117—118页。

②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210页。

③ 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第113页。

④ 关志昌:《裴文中与“北京人”》,台北《传记文学》第44卷,第3期,1984年3月。

⑤ 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第113页。

日至1939年6月30日所受损失即有:器具5849件,约值276379.79元;图书65800册,约值192230元;仪器251件,约值259113.80元;古物65件,约值4185元^①;总计73·19万元。战前至1935年1月,全国已有学术研究团体、机关共124个,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34个。除中央研究院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清华、北京、中央、中山、武汉、北洋、南开等10所高等院校的研究院。^②其中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新落成的楼房,包括图书馆、陈列室等,在日本攻占南京时全部毁于兵火。以上所有这些科研机构的损失加起来,当远远超过中央研究院一个机构的损失数字。

2、七七事变前后,全国各科研机构及各大学研究院所忙于搬迁,奔波于途,不可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有些单位科研工作中断的时间较长,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即以高校研究院所而言,据记载,“战前各校设置研究院或研究所者,计十二校,凡四十五学部。战事前两年,因学校迁移关系,大学研究院所曾一度停顿。一九三八年始逐渐恢复”。^③

3、迁至后方的科研机关,不断遭到日机的袭击和骚扰,研究工作时受影响。如昆明近郊的国立联合西南大学,研究和教学用的各个实验室,均置有一个大汽油桶,当警报响时,研究人员立即将最贵重仪器放置其中,除直接中弹外,可保无虞。研究人员则疏散到附近山上。警报解除,再走下山来,从汽油桶中取出仪器,将中断的研究继续下去。^④

4、自然科学的各门科学中,物理、化学研究等受日本侵华战争

① 《抗战估计损失》,中央研究院档案,卷号三九三(265)。

② 《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载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1937年中国科学社出版。

③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④ 李约瑟:《战时中国西南部科学之发展》,《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12期,1945年12月。

的影响尤大。其原因是,“我们的地质科学发展较早,数学与理化学等则在一九三〇年后开始,不幸处在萌芽阶段,却因抗战而停滞了”。^①

5、战前中国科研经费本不多,战时更大量缩减。为进行抗战,我国的军费支出至巨。1937年为13.7749亿余元,占国家总支出的65.5%,以后的军费支出,有增无已,1939年占国家总支出的51.8%,1940年和1945年分别占72%和69%。^②这样,抗战期间科研经费就只能打折支取。如中央研究院,战前经费每年130万元,战时“实领为原额之六三成”。^③1940年,“除了几个政府设立的研究机关大约每年共用二百数十万元外,其他私立研究机关合计起来当不到三十万元。……我国每年国库支出,若以十六万万计,科学研究经费当不及支出千分之二”。^④以这样少得可怜的经费,只能勉强维持跟抗战直接有关的应用科学方面的若干科研项目,纯粹科学则难以顾及。故有人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是中国“纯粹科学的严冬”。^⑤

6、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出版业受破坏极大,尤以商务印书馆为甚,以致科学论文及著作找不到出路,予科学家们以很大威胁。据当时教育部派往上海视察各学校及文化事业机关的陈沆藻、戴应观给教育部的书面报告,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除一小小疗养室外,全部已成焦土,断垣残壁,瓦砾成邱”。^⑥后商务印书馆耗资200万元,在香港建分馆,印行教科书,《东方杂志》等则在长沙印行。^⑦上海、香港先后被日本占领后,商务及各家出版社在沪港两地的印刷厂均被迫停办。在上

① 吴大猷:《回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21页。

②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564—565页。

③ 《中研院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总报告》,中央研究院档案,卷号三九三(2)。

④ 见任鸿隽:《抗战后的科学》,《东方杂志》第37卷第13号,1940年7月。

⑤ 陈遵妫:《抗战期内我国的天文界》,《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1943年3月。

⑥ 《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⑦ 《竺可桢日记》I,第213页。

海,商务印书馆“全部仓库财产均被日寇没收”。仅排印《四库全书》用铅字,就被劫去数十吨。世界书局“全部印刷财产被日敌没收”。日军利用世界书局机器设备,另行开设“华中印书馆”,专门印刷由日人审定、旨在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的教科书。其他各书局之印刷机及书籍等也均遭日军劫掠。上海各大出版公司如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摧残,陷于瘫痪。^①作为中国出版业中心的上海,各出版企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内地新办之厂,设备既简陋,物资人才尤感缺乏,对于各种自然科学书籍之排印,大都因无法制图,及缺少科学符号不能出版”。^②1932年至1934年的三年中,各家出版社在内政部注册的新出图书,自然科学共204种,应用科学共296种,两项相加共500种,平均每年166种。^③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年,1942年,商务印书馆、文通书局、文化供应社、建国书局、浙江大学研究所、独立出版社6家才出版纯粹科学著作11种,应用科学著作12种,“竟减少至可惊之程度”!^④怪不得李约瑟1942年在昆明各科学机构考察时,发现“论文的抄稿,在以往两年内堆积在这些研究所中者甚多。科学论文在中国得(不)到合适的印制,……这些事实对于中国科学界同人之精神实已构成一种很大的威胁”。^⑤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严重的。全国的大中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教育文化机关,均遭浩劫,鲜有不受袭击、侵扰、劫夺者。多少学府,多少文化殿堂成为灰烬。日本侵略者给中国教育文化事业造成的损失,极其惊人,举世罕见。就教育一项而言,据中国代表团在1946年联合国

① 审判汉奸李圣五档案,南京市档案馆藏。

② 谭勤余:《抗战期内我国科学出版物》,《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1943年3月。

③ 1935年《申报年鉴》。

④ 谭勤余:《抗战期内我国科学出版物》,《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1943年3月。

⑤ 李约瑟:《战时中国西南部科学之发展》,《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12期,1945年12月。

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提出的书面材料,“战时全国各级学校与教育人员直接间接所受损失,总额国币三二七四八一九〇〇〇元,合美金九亿六千六百零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元,……(竺可桢先生在联合国文教会所报告七亿余万元,系仅就直接损失而言,仅为损失总数字之一部分)”。^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破坏摧残是很严重的,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史料搜集)是很不够的。本文所作简述,期能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从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作者单位:江苏古籍出版社《民国春秋》编辑部)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